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六期
2012年5月　　頁107~157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李淵太原起兵的元從功臣
——兼論楊隋之世的關隴集團*

伍　伯　常**

摘　要

李淵在太原起兵時的元從功臣之中，具有關隴集團背景的只佔很少數目。無論是出身官僚或來自平民階層的太原元從功臣，皆對建制表示失望厭倦，部份甚至是身干罪譴而為建制所不容的亡命之徒；就地取材，是李淵吸納反隋力量的原則和措施。這個現象所蘊涵的歷史意義，在於突顯了採用關隴集團統治力量延續的理論來解釋李唐建國，明顯存在不足。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利用建制以外力量以衝擊建制的做法，早在楊堅和楊廣父子建立個人勢力的時候，已啟其端；在這個過程之中，部份關隴集團成員的利益優勢不斷受到衝擊，有些更被投閒置散，甚至淪為被整肅的對象。

關鍵詞：太原元從　關隴集團　關中本位制　山東豪傑　建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0.3.28 收稿，100.11.22 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兩位審稿專家在史料、研究文獻徵引及論點建立等方面，皆提出了很多極具參考和啟發意義的意見，使筆者處理有關歷史問題時，得到修正補充，從而令拙文的論點更加具體堅實。由於審稿專家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無法在修訂稿一一註明，唯有作選擇性表述，以示筆者不敢掠美，並藉此向兩位學者表達敬意謝忱。

** 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透過考述太原元從功臣的地域淵源和出身背景，以闡釋李唐（618－907）建國與招納建制以外勢力的密切關係。[1] 隋朝（581－618）末年大亂之世，建制之外勢力的類型，可以用多樣化一詞來形容，地方上由豪強、群盜、草根平民、胡族及宗教狂熱份子所組成的武力，都成為爭奪天下的群雄力圖爭取的對象。對於李唐創業這一段史事來說，李淵（唐高祖，566－635，

1 本文所稱的建制，是指作為統治實體的政權，以及這個政權出於管治需要，而在中央及地方兩個層次所建立不同級別和功能的行政組織機制。至於建制以外的力量，可作以下兩種理解：與政權沒有淵源甚至存在對立關係的另類社會政治力量，例如地方豪強、盜賊和亡國臣僚；本來出身建制的人物，後來因罪譴或權力鬥爭等因素而為建制所不容，最後更受到逼迫而踏上反建制之路。筆者嘗撰文解釋「建制」一詞的含義，以及考述李淵和李密兩人如何吸納建制以外的力量作為創業資本，詳見拙作〈隋唐之際的割據勢力——以貴胄出身的李淵和李密為中心〉，《東吳歷史學報》25 期（2011 年），頁 1－56。太原元從功臣與李淵創業的關係，其實很早已經受到學者注意。岑仲勉對於太原元從的重要性，嘗作這樣的說明；「『關中本位政策』或稱為『關隴集團』，以謂則天本家不在此集團之內，故蓄意破壞而代以新興進士。殊不知初唐已優待太原元從，〔參《會要》四五〕太原不屬西魏範圍，如當時果持此一政策，是從龍之輩已受排斥，其立說脫離現實甚明。」見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冊 1，頁 187。岑仲勉觀點的要旨，雖然在於反駁關隴集團的理論，但太原功臣李唐創業過程的作用，亦由此而反映出來。布目潮渢在李淵開國個課題嘗作深入研究：臚列創業功臣，並考述他們的社會階級和地域背景，從而道出李淵創業集團的性格；與創業集團性格有密切關係的亡命者、豪族和隸人等問題，皆作出了詳細論述，很有參考價值。有關部份，詳見〈李淵の起義〉及〈唐朝創業期における三省六部の人的構成〉，收入氏著《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8 年），頁 101－149；153－197。雷家驥亦曾就「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背景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太原起事首要人物中，關隴人物參與謀事定策的人數，遠比不上山東人物。」詳見氏著《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1－12。這個結論對於拙文的寫作構思，具有很大的啟發作用。至於太原這個地區在東魏北齊時代所發揮的政治軍事價值，可參考崔彥華，〈東魏北齊「鄴—晉陽」兩都體制形成原因試探〉，《中國史研究》輯 62（2009 年），頁 97－112。毛漢光對於這個地區在當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史事也有詳細說明，見〈北朝東西政權之河東爭奪戰〉，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頁 131－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18－626在位）推翻楊隋統治的力量來源，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溯源自西魏（534－556）北周（557－581）的關隴集團，一直被視為構成唐代統治階層的主體。自從陳寅恪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提出關中本位政策和關隴集團等歷史解釋的觀點後，引起學界廣泛注意和熱烈討論。[2] 從西魏、北周、楊隋以至

2 宋德熹在〈陳寅恪「關隴集團」學說的新詮釋——「西魏北周系」說〉一文，根據陳先生的著作，以及後來學者基於這個學說理論所開展的論述，把關隴集團的產生背景、地域、成員背景和權力結構，以及在西魏至隋唐之世所發揮的政治社會意義，皆作出了詳盡說明，而且材料徵引豐富，很有參考價值。該文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著，《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 年），頁 239－260。宋德熹尚有一書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重點，闡釋陳先生學說的具體內容，詳見氏著《陳寅恪中古史學探研——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例》（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4 年）。呂春盛對於關隴集團這個歷史課題，亦嘗作出深入研究，參考價值亦高，詳見氏著《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2 年）。大陸學者對於關中本位政策和關隴集團等學術觀點，也作出了評論，見黃永年，〈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和〈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54－182；胡戟，〈陳寅恪與中國中古史研究〉，《歷史研究》期 4（2001 年），頁 145－156；雷艷紅，〈陳寅恪「關隴集團」說評析〉，《廈門大學學報》期 1（2002 年），頁 72－79。唐代統治中堅的構成，在日本史學界亦是一個受到廣泛注意的課題，有關著作，可參考見谷川道雄著、耿立群譯，《世界帝國的形成：後漢——隋．唐》(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 年)，頁 149－158；山下將司，〈玄武門の變と李世民配下の山東集團—房玄齡と齊濟地方—〉，《東洋史學》卷 85 號 2（2003 年），頁 19－38；堀井裕之，〈即位前の唐太宗．秦王李世民集団の北斉系人士の分析〉、《駿台史学》號 125（2005 年），頁 21－45。筆者近期看到關於論述關中本位政策的文章之中，印象較深的，要算是盧建榮和李萬生的著作。盧建榮雖然臚列了不少學者對於陳先生史學研究貢獻的讚譽之辭，但他寫作要旨，似乎更著重於令中古史研究「走出陳大師的巨人身影」。詳見氏著《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臺北：時英出版社，2010 年）。這個取向，與李萬生論文的旨趣可謂南轅北轍。李萬生對於陳寅恪先生提出的觀點維護尤力，不僅在論文的第一段兩次用「最偉大」一詞來形容陳先生的研究，還花了很大的氣力貫通陳先生散見於諸篇的學說，以期使關中本位的理論更為縝密，而且駁斥岑仲勉及黃永年等前輩學者對於關中本位觀點的衝擊，更提出「學者對陳先生『關中本位政策』之說當取『心知其意』之態度，『疏通証明』之目的乃在探其真意，學其方法，以推動相關問題之研究，而不當以表面之理解為滿足。」詳見〈說「關中本位政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2010 年），頁 19－32。李萬生把岑仲勉及黃永年提出的論點，歸咎於他們僅根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立論，未能疏通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李唐帝位承傳系統的角度言之，關隴集團的確一直擁有獨佔的優勢。然而，當我們仔細審視李淵在太原起兵時麾下元從功臣的地域和出身背景，即可以發現具有關隴背景的功臣，其實只佔很少數目。這個現象所蘊涵的歷史意義，正是本文的討論要點；楊隋之世關隴集團所受到的衝擊及其演變，則是本文的另一個關注所在。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利用建制以外力量以衝擊建制的做法，李淵並非開風氣之先，早在楊堅（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和楊廣（隋煬帝，569－618，604－618在位）父子建立個人勢力的時候，已啟其端；在這

兼顧陳先生其他篇章的觀點，而筆者個人的看法是，岑仲勉和黃永年兩位學者提出異議，似乎並非純粹由於未能熟讀陳先生的著作，更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陳先生的論點本身確實存在漏洞。雷家驥嘗指出關中本位政策的論點「是有缺陷的」，並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當然，某些關隴官員為了確保他們已得的利益，某些山東及南朝官員為了爭取未得的利益，而互相結黨產生競爭衝突是可能的，但這一類事件幾乎在任何朝代均會出現。至於說構成地域政治集團，舉集團之力互相衝突，在隋唐之際則頗待商榷，在中國全部歷史則事屬罕見。論述隋朝唐代的政治風潮，竊意與其用地域政治的角度來申論，毋寧用個別案例或士、庶矛盾的角度來觀察，似乎更有可能得到歷史的真相。」見氏著《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頁 8－10。至於把褚遂良列為關隴集團的人物，雷家驥亦表示異議：「褚氏在漢代徙居河南陽翟，後來舉族南渡丹陽，世仕江左，為江南士族，斷不因其父子曾在中央做官，即列入關隴集團，若陳先生的推論法可以成立，則凡在隋唐做中央官的家庭，皆可列屬關隴人物，是則關隴、山東、江南，勢無明顯的分界。」見同書，頁 13－14。尚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李萬生在文中只集中闡釋陳先生在不同著作對於關中、關隴名詞所涉及的地域範圍如何不同，但這種取向，基本上不能解決非關隴力量在唐初政治軍事領域扮演重要角色這一個歷史現象。倘若作者寫作這篇論文的目的，在於保衛陳先生的論點，就論文處理問題的取向以至提供的歷史解說兩個層面而言，似乎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余生也晚，未嘗親睹陳先生的風采，惟從本科生學習生涯開始，即慕陳先生學養識見，於先生著作，尤為飽讀。本人很贊同陳先生所提出的關中本位政策，是宇文泰藉以穩定政權以至培養出足夠實力與高齊爭霸的基礎，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到的，是關隴集團亦如其歷史上出現的軍政集團一樣，既經歷了建立過程，同時亦應當包括變化發展而至性質上出現改變，到最後衰落而退出歷史舞臺的階段，從這個角度觀察，才能夠清楚明瞭這個集團應有的歷史地位。因此，拙文透過李淵太原元謀功臣出身背景的說明，考述李唐創業初期人材進用的取向，以及對關隴集團出現變質這一個歷史現象提供解說，這些都是對於陳先生學說所作的補充發明，絕非不敬。事實上，從事隋唐史研究，無論同意或反對陳先生的看法，每當談到北魏政權崩潰以至李唐立國所涉及的研究課題時，總不能繞過陳先生提出的觀點，而且每多在他建立的架構之中進行拆卸、翻新或修補；籠罩性強，也許正是陳先生學術成就的精彩偉大之處。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個過程之中，關隴集團的人物並不見得受到任何保護，相反，部份成員的利益優勢不斷受到衝擊，有些更被投閒置散，或遭貶謫，甚至淪為被朝廷整肅的對象。本文藉著探討以上兩個要點，盼可對李唐統治階層的構成以及地域背景淵源，能夠得到更深入而正確的瞭解。

二、太原元從功臣的地域出身背景與衝擊建制力量的形成

本節的要旨，在於說明李淵本來屬於關隴統治建制的核心成員，但為了顛覆楊隋政權，乃積極招納凝聚建制以外的力量，終於成功推翻建制，建立李唐政權。根據一般理解，顛覆政權的力量，每多來自與統治者對立的階級，但細觀中國歷史發展，顛覆政權的發軔力量，往往源於統治階層內部組織，而李淵起兵太原之前招納人材所作的謀劃部署，正是一個足資說明的例證。

李淵雖然是關隴集團的一份子，但當他起兵造反之時，並非身處關隴之地，根本無從發揮地緣優勢，而起兵的地點太原，則長期受到東魏（534－550）北齊（550－577）統治。[3] 因此，李淵籌劃起兵反隋的過程中，比較實際可行的招納對象，自然是在東魏北齊舊壤任職的官僚，以及在太原地區擁有深厚影響力的盜賊和豪傑。李淵深明這個道理，故出鎮太原之初，已經很著意招納地方力量作為己用。李淵本人固然身體力行，「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他亦命其子積極參與其事：「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4]《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李淵軍隊攻下西河旋師之日：

> 即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為燉煌公，為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子仍為太原郡守，命裴寂（569－629）、劉文靜（568－619）為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622）、劉正會（即劉政會，？－635）、溫大雅（572－629）、唐儉（579－656）、權弘壽、盧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雷家驥對於李淵反隋力量的地域所屬問題，也作出了性質相類似的說明：「隋煬帝失政，群雄並起，尤以山東地區最烈。若從當時地域區位看，太原留守李淵的一枝，亦屬於山東反抗集團。」見《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頁 7。

4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卷 1，頁 4－5。

思德平、武士彠（559－635）等為掾屬、記室參左等官。以鷹揚王長階、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582－650）等分為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用。[5]

這條史料，道出李淵太原起兵時所倚重的人物及其職任，茲列表交代他們的地域淵源和出身背景：

姓名	地域淵源背景
裴寂	「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疏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游。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6]
劉文靜	「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7]
殷開山	「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秘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

5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1，頁 13。

6 劉昫（887－946），《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57〈裴寂傳〉，頁 2285－2286。

7 《舊唐書》，卷 57〈劉文靜傳〉，頁 2289－2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8]
劉正會	「滑州胙城人也。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為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9]
溫大雅	「太原祁人。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10]
唐儉	「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群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

8 《舊唐書》，卷 58〈殷嶠傳〉，頁 2311。

9 《舊唐書》，卷 58〈劉政會傳〉，頁 2312－2313。

10 《舊唐書》，卷 61〈溫大雅傳〉，頁 2359。李淵鎮守太原，對溫大雅甚為禮重：「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見《舊唐書》，卷 61〈溫大雅傳〉，頁 2359－2360。《大唐創業起居注》亦出自其手筆，彼此關係密切的程度，於此可見。溫大雅雖為李淵所厚，後來卻成為李世民的黨羽：「太宗以隱太子、巢剌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見同書，頁 2360。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11]
權弘壽	正史無傳，事蹟見於其孫權懷恩在《舊唐書》的傳文：「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荊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孫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壽，大業末為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封盧國公卒，謚曰恭。」[12]
盧階	未詳。
思德平	《冊府元龜》載有「田德平」的事蹟：「太原晉陽人，隋末補鷹揚府正。高祖留守太原，引為兵〔疑有闕文〕，大蒙任寄。義師起，拜銀青光祿大夫，歷大將軍兵曹參軍，封漁陽縣公。」[13] 筆者傾向相信「田德平」即「思德平」的異寫。
武士彠	「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為太原留守，引為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彠曰：『此並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彠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彠為大將軍府鎧曹。」[14]
王長階	兩唐書無傳，《通鑑》稱他為高平人。[15] 高平是唐代澤州治下一縣，

11 《舊唐書》，卷 58〈唐儉傳〉，頁 2305。有關唐儉在李唐創業過程之中所作出的貢獻，可參考牛致功，〈唐儉與李唐建國——讀〈唐儉墓誌銘〉〉，收入氏著《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頁 1－14。

12 《舊唐書》，卷 185 上〈權懷恩傳〉，頁 4798。另可參考布目潮渢，〈唐朝創業期における三省六部の人的構成〉，頁 159－160。

13 王欽若（962－1025）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766〈總錄部・攀附二〉，頁 9106。

14 《舊唐書》，卷 58〈武士彠傳〉，頁 2316－2317。

15 司馬光（1019－1086）編著、胡三省（1230－1302）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84〈隋紀八〉，頁 5739。該書下文簡稱《通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屬河東道。[16]《冊府元龜》記載太原起兵時有一「王長諧」，相信與王長階屬同一個人：「隋末從太宗舉義，平河西郡，遂為太守，召募得數千人，與大軍西會，以為右一統軍，從破宋老生，進授光祿大夫。」[17] 同書另一段史料記載王長諧任職西河太守時：「從太宗下長春宮，與劉文靜先據永豐倉。時隋將劉綱戍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險，長諧揣知其計，率眾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保北城。長諧與通頻戰，皆尅。及通之遁也，與諸將追至稠桑而虜之，因進下陝城，取大原倉。」[18]
姜寶誼	「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為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遊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為左翊衞，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19]
楊毛	兩唐書沒有〈楊毛傳〉，《通鑑》記述太原起兵將佐，有「陽屯」之名。[20]《冊府元龜》，則載有「楊屯」的事蹟。按「毛」、「屯」形似，「楊」、「陽」音通，筆者相信史文出現的「楊毛」、「楊屯」以及「陽屯」等名字，皆屬同一個人名字的異寫。現引錄《冊府元龜》有關楊屯的事蹟如下：「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為高麗所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先登力戰，其功居最。」[21] 另一條史料是關於楊屯隸屬李淵麾下時的功業發展：「初仕隋為鷹揚郎將，遇高祖討捕于太原，屯領部兵于麾下。性謹直，勇於政戰，高祖甚愛寵之。遇起義，以為統軍。從太宗擊西河，平

16 《舊唐書》，卷 39〈地理二・河東道〉，頁 1478－1479。

17 《冊府元龜》，卷 413〈將帥部・召募〉，頁 4916。

18 《冊府元龜》，卷 428〈將帥部・料敵〉，頁 5102。有關王長階事蹟考述，可參考布目潮渢，〈唐朝創業期における三省六部の人的構成〉，頁 164。「王長階」之名，不同史料有不同的寫法，羅香林以「王長諧」為是，詳見〈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頁 43。另見拙作〈從窆獻陵——論唐初陪陵宗室功臣的生平事蹟及陪陵制度的政治社會意義〉，《中國中古史研究》期 10（2010 年），頁 151。

19 歐陽修(1007－1072)、宋祁(998－1061)，《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新唐書》，卷 88〈姜寶誼傳〉，頁 3741。

20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39。

21 《冊府元龜》，卷 395 下〈將帥部・勇敢二下〉，頁 46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霍邑，竝功居最，以佐命元勳，約免一死。歷諸衛大將軍，甚蒙遇任。」[22]
長孫順德	「文德順聖皇后（601－636）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群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為備。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眾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23]
竇琮	扶風平陵人，唐高祖太穆皇后的族人，竇軌之弟，「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為統軍。」[24]
劉弘基	「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廕為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托，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臥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為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25]

根據上表所列資料，可得而論者有以下數點：

1. 表中涉及的人數共有十六個，當中權弘壽、盧階、思德平、王長階和楊屯於兩唐書無傳。出現開國功臣而正史無傳現象的原因，在於唐人所修國史，乃日後出現諸種唐書的重要史源，「而唐人國史，則列傳每有所偏，於唐初隨從創業之輩，其名節不甚顯者，亦每不為入傳，今以《大唐創業起居注》所錄校之，其有見遺於新舊書列傳，而其事蹟又於李唐創業不無相當關係者，亦有數人，如通議大夫張綸，是其例也。」[26] 換言之，上列參與太原起兵而不入於國史的人物，在於他們的事功僅止於太原創業的階段，到了李唐在關中建國稱帝以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2 《冊府元龜》，卷 345〈將帥部．佐命六〉，頁 4092。有關「楊毛」的姓名和事蹟考證，可參考布目潮渢，〈唐朝創業期における三省六部の人的構成〉，頁 164。

23 《舊唐書》，卷 58〈長孫順德傳〉，頁 2308。文德順聖皇后，即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551－609)之女，唐太宗之妻。

24 《舊唐書》，卷 61〈竇琮傳〉，頁 2367。

25 《舊唐書》，卷 58〈劉弘基傳〉，頁 2309。

26 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頁 40。

事功再沒有繼續發展下去。

2. 權弘壽和盧階兩人的事蹟，已經無從稽考；思德平的事蹟亦只存在於零章斷簡的記載，不足以重建他的生平勳業。可考的十三人之中，只有劉文靜、姜寶誼、竇琮、長孫順德和劉弘基五人的家世背景，可以和關隴集團扣上關係。他們跟隨李淵父子叛亂，大部份緣於不滿現實，甚至不為建制所容的原因造成。例如劉文靜一直希望建立功業，但他明白到在當日固有的建制格局之下，基本上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而投靠李淵父子，便成為了打破困局惟一可行的方法。後來他更因為與李密聯姻而被朝廷逮捕，「繫太原獄」。[27] 這種遭遇，更強化他衝擊現有政權的決心。在李淵集團的重要臣僚之中，不乏被建制排擠疏忌的人物，因此，劉文靜的經歷，不能視作為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意義。《通鑑》嘗把部份投靠李淵的人物背景原因作綜合說明，以顯示他們具有相類性質的特點：

> 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28]

長孫順德與李世民有姻親關係。[29] 至於劉弘基，他嘗「背徵三侍」，從太原守臣王威和高君雅效忠於建制的觀點出發，無疑是「所犯當死」。[30] 而引文提到的竇琮亦嘗在「大業末，犯法」，被迫亡命太原。根據史傳記載，竇氏一族失意於楊隋政權，並非只有竇琮一人，竇琮之兄竇軌，也在隋煬帝之世很不得意：「隋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31] 按竇琮族人竇抗（?－621）的母親是「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32] 可見竇氏家族，本來與楊隋帝室關係非常親厚，惟諸竇之中，竟以竇抗顛覆楊隋政權的態度最為積極：

> 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為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啟也。」高

27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29。

28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28－5729。

29 有關長孫順德的家世淵源，見拙作〈從窆昭陵：論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陵功臣〉，《九州學林》卷 3 期 4（2005 年），頁 16。

30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4。

31 《舊唐書》，卷 61〈竇軌傳〉，頁 2365。宋德熹嘗撰文探討竇氏在關隴集團的史事，見氏著〈關隴集團政權中的河南竇氏——代北外戚家族個案研究之二〉，《興大文史學報》期 22（1992 年），頁 105－144。

32 《舊唐書》，卷 61〈竇抗傳〉，頁 23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祖曰：「無為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眾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為樂。[33]

竇抗與李淵過從密切，不僅在於「少相親狎」，他還具有「妃兄」的身份，即與李淵多了一層姻親關係。[34] 然而，竇抗畢竟是帝室的懿親，似乎沒有理由會積極鼓吹李淵叛亂。箇中原因，可從竇抗在隋煬帝一朝的仕宦境況得到理解。竇抗在隋文帝之世雖然備受崇寵，但到了隋煬帝繼位後，竇抗的境況驟然變得異常艱難：「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為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35] 竇抗在隋煬帝時代的經歷，促使他的政治立場出現重大改變，由以前作為建制中堅份子，轉而成為打倒建制的積極份子。[36] 這個事例，道出縱使是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有時候也會因為個人際遇不副所望，而萌生叛志。

3. 上表所列舉李淵起兵太原之時所任將佐的地域出身背景，頗能顯示出就地取材和吸納建制以外力量以衝擊建制的特點。細觀李淵的仕宦經歷，當可發現這種用人取向，實其來有自，現舉李淵任職河東討捕使及太原留守時所作的舉動說明其況：

> 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床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

33 《舊唐書》，卷 61〈竇抗傳〉，頁 2368。竇抗慫恿李淵舉兵反隋史事，可參考汪籛，〈李淵晉陽起兵密謀史事考釋〉，收入氏著《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228－229。李淵自建國後，與竇抗的關係一直很好：「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卧內，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為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為舅。常陪侍游宴，不知朝務。」見《舊唐書》，卷 61〈竇抗傳〉，頁 2368。

34 《通鑑》，卷 185〈唐紀一〉，頁 5785。

35 《舊唐書》，卷 61〈竇抗傳〉，頁 2368。

36 有點必須指出的，是竇抗雖然在立場和言論兩方面皆投向李淵，但對於李淵創業，並沒有發揮直接的作用，原因是他任職的地點靈武與太原相距甚遠，而且在李淵底定關中之後，才「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見《通鑑》，卷 185〈唐紀一〉，頁 5785。竇抗對於李唐所作的貢獻，也是他歸唐之後才出現：「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見《舊唐書》，卷 61〈竇抗傳〉，頁 2368－23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37]

夏侯端是夏侯詳之孫，梁武帝起兵荊、雍，夏侯詳為其佐命，則夏侯端實出身南朝系統，而且擅長占候相人。李淵在河東任職，主動請夏侯端充當副手，顯示他沒有刻意邀請具有關隴背景的官僚共事，甚至可能已經盤算著如何利用占候相人這一類異術，來製造有利於自己創業的輿論。至於勸說李淵舉兵的許世緒、武士彠、唐憲和唐儉，也沒有一個來自關隴集團：「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38] 武士彠則是周旋於不同勢力的地方豪強；[39] 唐憲

37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2－5733。有關李淵與夏侯端對話時已萌叛隋之念，見〈李淵晉陽起兵密謀史事考釋〉，頁 229－230。

38 《舊唐書》，卷 57〈許世緒傳〉，頁 2298。

39 武士彠在太原起兵前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問題。武士彠是太原豪強，家富於助，具有深厚地方勢力。政治取向上言，他一方面向李淵進言取天下，但同時又與楊隋地方官保持良好關係，可以說是一個心存投機而兩面討好的人。對於李淵來說，這一類立場不明確的人，當然不是共謀叛亂的理想人選，但由於武士彠在急切關頭，選擇站在李淵那一邊，所以在李淵眼中，便變成了「微功可錄」。武士彠另一個被李淵引為元從功臣的原因，在於他的經濟力量。太原起兵時，武士彠的職任是鎧曹，負責軍需品供應。李唐創業初期，需財孔給，擔任鎧曹之職，由於經常要自出資財補貼，因此必須由富人充任。武士彠受到李淵寵待，與其家富於財而能在王業草創時期提供經濟支持，有很密切的關係。也許出於這個原因，李淵即位以後，頗意識到要進行心理補償，以淡化那段艱難歲月所造成的心理陰影，其中一個辦法，是高調展示帝王富有四海而物力無窮的氣象：「武德初，勅宴元勳人等於含章殿，賜酒作樂，散金銀錢頗羅等，任取多少。」所謂「元勳人」，當中便包括了武士彠。見《冊府元龜》，卷 345〈將帥部・佐命六〉，頁 4091－4092。以富貴驕人，既是一種心態扭曲的表現，同時亦反映了李淵對於創業初期資財匱乏的景況，印象終難磨滅。有趣的是，武士彠在武德年間「檢校并鈺將軍」時，依然「多有獻納」。見《冊府元龜》，卷 626〈環衛部・選任〉，頁 7521。有關武士彠的致富事蹟，可參考陳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該文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73－278。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和唐儉是唐鑒之子，而唐鑒與李淵有舊。[40] 以上四人，武士彠和唐儉被《大唐創業起居注》列入元從功臣的名單之中。除了名列史冊的人物外，尚有相當數量的中下級元從功臣，他們的事蹟見於墓誌，霍達是其中一個例子：「河東人也，今寄貫洛陽焉」；「祖生，齊鄴縣令；父寶，隋鷹」；霍達在「大業中，拜建節尉。自義旗爰指，即預元功，服勤旦夕，授將仕郎。」[41] 由於祖籍李淵出鎮地區晉陽的元從功臣在數量上佔了一個相當顯著的比例，楊炯（650－692）撰寫〈瀘川都督王湛神道碑〉，嘗就地域因素作以下的發揮：

> 惟漢高祖（劉邦，前256－前195，前202－前195在位）應天順人，祭蚩尤於沛庭，斬大蛇於豐澤，則豐沛之豪傑乘於雲矣。惟漢光武（劉秀，前6－57，25－57在位）龍飛鳳翔，舉新市之八千，破王尋之百萬，則南陽之佐命動於天矣。我高祖神堯皇帝以唐侯而建國，從晉陽以起兵，協和萬邦，光宅天下，則太原之衣冠有大勳矣。[42]

晉陽與元從功臣地域背景關係之密切，從上引的史文清楚地反映出來。事實上，李淵入據長安建立政權後，對太原元從嘗流露出眷顧之情，《冊府元龜》以下一段武德二年閏二月甲寅的記載，便具體展示了李淵這一份情懷：

> 帝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曰：「朕起義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實諸君之力也。卿輩執鞿靮從我，已三歲矣，朕每念之，無忘寢食，待東都平定，當放卿還故鄉。」眾皆曰：「幸遇龍興，獲展微効，俱沾不次之賞。今天下未定，豈敢辭勞？陛下初發太原，許定天下之後，與臣輩同幸并州，今鑾輿未動，臣下何能獨去？」帝曰：「昔有此言，朕所以忘。」於是廩食其妻子。[43]

引文談到照顧太原元從家屬衣食的具體措施，發生在同年四月甲寅：「出庫物一百五十萬段，以分賜太原元從人。」[44] 以上所述的元從關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

---

40 《舊唐書》記載唐憲和唐儉之父與李淵的淵源曰：「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見，卷 58〈唐儉傳〉，頁 2305。

41 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上冊，〈唐故將仕郎霍君墓誌銘并序〉，頁 412。

42 楊炯，《盈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卷 8〈瀘川都督王湛神道碑〉，頁 68。

43 《冊府元龜》，卷 172〈帝王部．求舊二〉，頁 2073。

44 《冊府元龜》，卷 128〈帝王部．明賞二〉，頁 1531。李淵佔據京師後，已經在義寧二年正月：「論功行賞，其登京城第一勳授光祿大夫開國郡公，物一千段，雖第一勳而身死者，亦准此其官迴授子弟，宅奴婢仍並量給；第二勳人各授三轉，物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種情誼，都是本文質疑出身關隴集團的人物在李淵叛隋自立的過程之中，曾否成為麾下中堅力量的其中原因。[45]

4.《大唐創業起居注》所列非關隴集團出身的元從功臣，尚有裴寂、殷開山、劉政會、溫大雅和楊屯。[46] 從地域淵源的角度來說，大部份人的原居地，皆入於高齊和南陳昔日的領土。政治上言，他們不僅與關隴集團沒有親厚關係，部份更有厭棄楊隋政權的傾向。例如溫氏父子出身北齊系統，對楊隋頗為疏離，情願棄官家居。《隋書》嘗稱隋朝晚年，「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47] 這種情緒，不僅只在李淵元從功臣的心目中出現，更可以視為一個普遍現象。[48] 可見政局動盪，是某些官僚對建制產生厭棄情緒，繼而投向李淵陣營的原因。亦

百段，第三勳人從朝散加。」以上所錄的獎賞標準，並無標示任何地域淵源作為先決條件，而武德二年四月甲寅的賞賜，則純粹是用來酬答太原元從功臣的翊戴之勞。

45 近年有學者質疑關隴集團在唐代能夠依然扮演舉足輕重的政治角色，例如黃永年在〈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一文中，對唐高祖和唐太宗兩朝宰相功臣的地域出身背景和是否文武合一作出統計，以證明關隴集團的優勢在唐初兩朝已經不復存在。該文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頁 169－182。

46 宋德熹認為裴寂的祖父兩代俱仕北周，當歸入為關隴集團的基本成員。作者並提出研究上古政治社會的歷史課題時，不能單純只片面採信籍貫或郡望記載的看法，應該把周隋唐三代正史列傳「合而觀之」，可是「部份學者不此之圖，轉以籍貫作為區分人物所屬地域集團之唯一標準，殊不知中古時期史傳有時舉其郡望，體例不一致」。見氏著〈陳寅恪「關隴集團」學說的新詮釋——「西魏北周系」說〉，頁 245 註釋 19。史料出現郡望與籍貫兩者不符的現象，岑仲勉嘗撰文論述，見氏著《唐史餘瀋》（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4〈唐史中之望與貫〉，頁 229－233。基本上言，筆者很同意宋德熹的看法，但同時亦經驗到實踐起來，往往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原因在於正史描述傳主仕宦不太顯揚的先世時，往往只述官職而略其時代，這種敘述方法，無疑令集團屬性的考證上增添不少困難，正如《舊唐書》本傳並無明言裴寂祖、父兩人為那個政權效職，所以筆者採用比較保守的做法，將裴寂歸入非關隴集團一類。以籍貫作為區分人物所屬地域集團標準的做法，亦見於 Howard J. Wechsler 所著"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該文收入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7-120。

47 魏徵（580－643），《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卷 67〈裴矩傳〉，頁 1582。

48 例如蔡君長，出身仕宦家庭：「隋後主以公良家著族，時望所歸，遂授　車騎，仍轉驃騎。公以後主荒怠，政出多門，遂掩效扉，以俟有聖。皇運之始，以公見幾先覺，遂授定州司馬。」見〈唐故定州司馬蔡朝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上冊，頁 6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部份感到為楊隋政權效力，已經沒有甚麼前景可言，而轉投李淵，遂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49]

5. 李淵招納關隴集團以外力量的心態，亦在聯姻的事情上具體表現出來，例子是李淵的女婿柴紹（?－638）：

>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50]

地域上言，柴紹家鄉入於北齊領土，其祖仕周，大概是北齊亡國後開始。換言之，柴紹實源自高齊系統。以上例子，顯示李淵一直注重招納人材，尋找締婚對象時，是否關隴集團出身，並非考慮因素；[51] 不受制於地域因素，自然可以更有彈性地廣事招徠關隴以外的勢力。無論是否出身貴家，或身干罪譴，而為建制所不容的亡命之徒，皆被李淵父子積極拉攏收編，組織成為衝擊楊隋政權的強大力量；劉文靜、劉弘基和長孫順德等共執王威、高君雅等繫獄，亦足以說明為建制所不容的人物，最後往往變成了反建制的急先鋒。

6. 李淵真正立下決心步上覆滅楊隋政權之路，亦肇始於本身干犯罪愆，不復為建制所容。[52] 李淵在太原起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受到爭論的歷史問

---

49 裴寂是當中的顯例。他一直很在意富貴功名，甚至禱神時所表達的願望，以至和劉文靜對話內容，亦離不開這個話題。因此，李世民謀劃與裴寂建立合作關係時，很懂得對症下藥，以金錢資助作為開始。

50 《舊唐書》，卷 58〈柴紹傳〉，頁 2314。

51 筆者嘗就柴紹的家世背景有所說明，見拙作〈隋唐之際的割據勢力——以貴胄出身的李淵和李密為中心〉，頁 18－19。審稿專家對於李淵締婚對象作更一步的發揮：「李淵不僅以婚媾招納非關隴集團勢力，同時也以聯姻方式結好當時東亞霸主的東突厥。出土墓誌中，〈唐故右屯衛翊府右郎將阿史那施墓誌〉記有：『〔阿史那施〕父摸末，單于郁射設，即處邏可汗嫡子也。……太宗敕書慰問曰：突厥郁射設，可憐公主，是朕親舊，情同一家，隨〔隋〕日初婚之時，在朕家內成禮，朕亦親見，追憶此事，無時暫忘。』；〈故右屯衛將軍阿史那公墓誌〉記載：『公諱摸末，漠北人也，……夫人李氏，平夷縣主……。』阿史那摸末是東突厥啟民可汗之孫、處羅可汗之子，夫人李氏，與李唐同姓，從誌文中所記『是朕親舊，情同一家』、『在朕家內成禮』以及李氏被封為『平夷縣主』，推測李氏與李淵一家是宗親關係，李淵在太原起兵前已透過聯姻方式與東突厥結好。作者若補充此例，則更能說明李淵尋找締婚對象不受制於地域因素，以彈性地廣事招徠各種勢力。」承審稿專家提示以上史料和內容解說，筆者謹致謝忱。

52 楊軍論述李淵起兵太原時，批評學者們的理解尚停留在「李淵早已具有蓄謀取代隋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題。有學者認為李淵本身雄才大略，問鼎之心其來有自，並非受到李世民啟發鼓動後，才萌生起兵叛隋的念頭。[53] 李淵有異志，早在其於大業十一年（615）任職河東討捕使時已經透現出來。他不僅「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而且在兩人交談之中，曾經涉及「今玉床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等悖逆言論。[54] 可見李淵在這一年，心中已貯有謀叛之念。他在第二年「遷右驍衞將軍」，到了大業十三年（617），授職太原留守。[55] 那個時候，李淵已經很明顯有自立的想法，而且開始積極進行人事部署。《舊唐書‧任瓌傳》載其事曰：「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589－626）以托於瓌。」至於任瓌（?－629）的出身背景和所建功績，《舊唐書》作以下的描述：

> 盧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557－589）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逾己子，每稱曰：「吾子侄雖多，並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為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

朝的主觀意圖這個觀點出發，認為李淵起兵完全是他乘隋末天下大亂、群雄并起的混亂局勢主動起兵并乘虛而入關中，最終完成了隋、唐兩朝的交替」的水平。楊軍對李淵起兵前的兵力與周邊軍事集團作出比較，以及探討劉武周佔據馬邑叛亂，並根據以上兩點解釋李淵起兵的起因，詳見氏著〈李淵太原起兵的地理因素考察〉，收入徐少華主編，《荊楚歷史地理與長江中游開發——2008 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42－254。楊軍的觀點，與筆者的看法有別，茲徵引以供讀者參考。

53 羅香林早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根據《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考述李淵頗有材略，並非「僅若一普通福將」，而且早貯異志，不必等待李世民啟發，才萌生取隋自立的雄心，詳見〈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頁 24－31。羅香林的看法，一直得到很多學者支持，例如牛致功論述李淵在太原起兵所扮演的角色時，看法基本上與羅香林相同。見牛致功，《唐高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2－19。有關論述，亦可參考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和〈論高祖之才略〉，兩文收入氏著《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98。

54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2。

55 《舊唐書》，卷 1〈高祖紀〉，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庫

> 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眾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617）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眾，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56]

引文顯示任瓌與關隴集團全無淵源：他出身南陳，對故國甚為懷戀，對楊隋則欠缺親附之情，因此入仕較晚，而且不久於任。任瓌的仕途出現新發展，始於謁見李淵。李淵得悉任瓌是「將家子，深有智謀」，可以作為叛隋以後大戰略制訂及施行的顧問，即授以職事，並委以心腹之寄，故其出任太原留守時，以子李建成為託。可見李淵授任瓌以職任之舉，頗有預先招納人材以備日後謀反之用的意味。及至兵起太原，李淵詢之以用兵之策，所陳之言，甚協李淵之見，故委以要職。任瓌有智略，所任多集事，功勳卓著，頗昭李淵知人之鑒。[57] 除

56 《舊唐書》，卷 59〈任瓌傳〉，頁 2322－2323。

57 任瓌除了在大戰略的層面上給予意見外，也在行軍用兵多所貢獻。史稱其向李淵獻策後，李淵：「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見《舊唐書》，卷 59〈任瓌傳〉，頁 2323。任瓌智略，亦具見於以下史事：「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621）數率眾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為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為徐州行台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623）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浚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594－632）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浚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為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

臺灣大學術 明和資料庫

了任瓌的例子外，《大唐創業起居注》亦載：「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58] 以上資料顯示，李淵比其子李世民更早有經營天下的打算。然而，李淵早貯異志與真正付諸行動，兩者的距離尚遠，促使李淵決意起兵叛隋，在於他本身亦不為建制所容，而締造這個局面環境的人，正是他的兒子李世民。《通鑑》記載其事曰：

> 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並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

『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浚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任瓌的事跡，具體道出非關隴人物對於李唐創業所作的貢獻。任瓌有能名，然亦有性格弱點：「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妒悍無禮，為世所譏。」其弟任璨，任職東宮：「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為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由於受到宮廷鬥爭牽累，故任瓌在貞觀三年(629)去世時，朝廷沒有封贈。詳見同書，頁2323－2324。

58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59]

李淵心中一直有覆滅楊隋政權之心，但表面上仍為隋煬帝效力；有異志而不為李世民所知悉，正好展示了李淵深沉的一面。其子李世民雖有異心，但懾於形勢欠缺明朗，故未敢在其父面前有太多的異動。李世民要打破困局，必須要將其父拉入顛覆政權的陣營，亦即設計令其父干犯罪譴，為建制所不容，才能夠迫使其父踏上反叛之途。李世民籌辦這件事情，可謂儲心積慮：他首先結交裴寂，再藉其為晉陽宮監的職權之便，進獻美色宮人誘惑李淵犯罪，李淵私寢宮人，自不為法紀所容，則李世民佈局驅使其父謀反，於焉完成。根據上引《通鑑》的記載，馬邑拒敵失利，發生在裴寂重提晉陽宮人侍寢舊事之前。換言之，拒敵失利一事，尚未足以令李淵正式起兵叛隋：

> 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60]

誠然，軍事失利而受到懲處，是李淵謀反的動力，惟一旦懲處的壓力消失，謀反欲望的強度，便即時消減。可見李淵雖然貯有異志，惟其性格趨向於保守，不習慣作冒險之舉，凡事力圖萬全，而晉陽宮人事件，在效果上言足以強化李淵謀反的動力，《通鑑》對晉陽宮人事件對於起兵太原的推動作用作以下說明：

> 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眾。[61]

劉文靜深悉舉兵是刻不容緩之事，李淵卻遷延不發，實取禍之道，故借私寢宮

59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0－5731。李淵起兵太原前與突厥的互動關係以及曾否稱臣等問題，朱振宏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詳見〈「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的再檢討〉，收入氏著《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頁 45－96。

60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1－5732。

61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之事，來加強迫使李淵謀反的力度。劉文靜之舉，自然是李世民授意。尚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李淵頗牽於骨肉之愛，諸子人身安全，在其通盤考慮之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也許李淵一直顧慮諸子安危，行動遂變得謹慎保守，雖然心中早已盤算著起兵叛變，卻始終沒有認真地籌劃執行。《大唐創業起居注》稱李淵拒戰突厥失利，被隋煬帝派人拘繫，「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李淵嘗向李世民說：「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62] 及至李淵決意起兵後，依然不脫骨肉安危為重要考慮的況味：「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63] 柴紹是李淵的女婿，召喚柴紹，亦等同召其女兒急赴太原，以免落入隋人手中。而李建成和李元吉（603－626）「至自河東」時，李淵表現「懽甚」。[64] 李淵採取謹慎態度，亦未始無因：李世民汲汲於慫恿其父起兵謀反時，家人正居於河東和關中，若走避不及，性命即有頃刻之虞，死生實未可逆料。事實上，當李淵起兵太原時，李建成和李元吉為了逃避隋人追捕，即委其幼弟李智雲（?－617）於不顧，終為隋人所獲殞命。[65] 這件事情，反映李淵諸子之間的兄弟之情淡薄，在太原起兵之時已見端倪，而玄武門骨肉相殘，也不外是李家兄弟之情淡薄傾向的延續和強化而已。

上引《大唐創業起居注》所列的人物，只是較為核心的部份，尚有一些重要性稍為次等的僚屬參與太原起兵；[66]《通鑑》所載，可以在這方面作出補充：

> 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624)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謇(557－627)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

62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1，頁 4。

63 《通鑑》，卷 183〈隋紀七〉，頁 5733。

64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1，頁 10。

65 《舊唐書》，卷 64〈李智雲傳〉，頁 2423。

66 當然，所謂核心與否，是一個相對的觀念。《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的人物之中，有部份還不算是真正核心。例如武士彠沒有參與起兵前的籌劃部署，原因是李淵視之為王威和高君雅一黨，及至高君雅和王威被擒殺後，武士彠才得到李淵諒解，而且置入元從功臣之列。所以，從密切親厚程度上言，武士彠與裴寂和溫大雅等人，始終未可相提並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民為敦煌公，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咨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67]

比較兩種記載，可見《通鑑》所載的人物，多了溫大有、崔善為、張道源和姜謨四人。現列表以述諸人的淵源背景：

姓名	淵源背景
溫大有	太原祁人，溫大雅之弟，「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為太原令。」[68]
崔善為	「貝州武城人也。祖顒，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為好學，兼善天文算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為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為總監，巡至善為之所，索簿點人，善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為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為太守，甚禮遇之。善為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為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69]
張道源	并州祁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70]
姜謩	「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71]

上述諸人，皆在正史有傳。諸人之中，只有姜謩源出於關隴集團，其他人物，與這個集團沒有直接關係。這些資料，再次道出李淵在太原建立反隋力量，就地取材是重要原則。溫大有是溫大雅之弟，亦仕於李淵，史料稱李淵公開叛隋

67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39－5740。
68 《舊唐書》，卷 61〈溫大有傳〉，頁 2362。
69 《舊唐書》，卷 191〈崔善為傳〉，頁 5088。
70 《新唐書》，卷 191〈張道源傳〉，頁 5503。
71 《舊唐書》，卷 59〈姜謩傳〉，頁 2332－23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很重用溫大雅：

> 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72]

《通鑑》對這段史事亦有記載，並且具體解釋李淵令溫大有同行的原因：「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73] 可見攻伐西河的軍事政治意義，正如李淵所云，具有標示的作用，而李淵在這次軍事行動之中，所倚任的，正是關隴集團以外人物，則關隴集團在這個階段對於李唐創業，似乎只扮演著邊緣的角色。根據上引《舊唐書》記載，姜謩出身關隴集團，大業末年任職晉陽長。可見李淵謀劃叛隋時，雖然表現得小心翼翼，結納關隴以外的人物共謀大事，目的在於減少謀逆洩漏的機會，避免招致滅門之禍，但對於在其轄境任職的關隴人物，並非完全採取疏忌排斥態度。不過，那些人必須首先積極展示投托之意，以釋李淵疑慮。畢竟推倒建制，卻倚任建制中人，始終有容易走漏風聲之虞。

其實，《通鑑》所列舉的人物，並沒有窮盡所有參與太原起兵的僚屬，若細閱史傳所載，可以發現還有很多曾經參與過李淵創業活動而且建立功勳的人物，沒有被《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通鑑》收載，例如前文提及的許世緒。《舊唐書》本傳記載他勸說李淵勸起兵叛隋後，「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74] 許世緒的事例，反映了當日向李淵建言的人數量甚多，李淵雖然向那些人接以溫顏，且獎賞有加，但沒有可能把他們所有人皆結為心腹，許世緒不預《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通鑑》所載的元從功臣之列，大抵是出於這個原因。另一個例子是段志玄（?－642），《舊唐書》記載有關的史事如下：

> 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為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為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75]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72 《舊唐書》，卷 61〈溫大有傳〉，頁 2362。溫氏兄弟在隋代位職清要：「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見《舊唐書》，卷 61〈溫大有傳〉，頁 2362。引文指出溫氏昆仲在李唐之世，仕途才有重大開展，而決定因素，在於溫氏兄弟在創業過程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73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38。

74 《舊唐書》，卷 57〈許世緒傳〉，頁 2298。

75 《舊唐書》，卷 68〈段志玄傳〉，頁 2504－2505。段志玄為李世民接待，可以作為

以上引文，道出一些創業功臣本貫不在并州，但由於種種原因而在太原供職，遂成為李淵收納的對象。[76] 正史之外，墓誌碑銘亦多這一類記載，可以顯示參與太原起義人物的地域出身背景，為本文的論點提供補充說明。[77]

及至李淵正式起兵叛隋後，已經沒有在策劃謀反階段時慎防走洩風聲的顧慮，招納對象，便變得毫無地域和淵源的限制。因此，李淵從太原舉兵入京後，一路上都很著意收編建制份子，以壯大集團的力量，而收納楊隋地方守臣歸降，正是這種政策的具體表現。有關史料，不乏這方面的記載。例如盛彥卿：「隋末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高祖，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78] 建制出身而沒有職任的，

李世民在太原著力招納四方英豪的佐證。

76 參與太原起兵而見於史傳的人物尚有很多，例如趙文恪：「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見《舊唐書》，卷 57〈趙文恪傳〉，頁 2296；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為軍頭。」見同書，〈張平高傳〉，頁 2279；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覘覘動靜，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見同書，〈李思行傳〉，頁 2279；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見同書，〈李高遷傳〉，頁 2279。以上引錄的人物，沒有一個來自具有關隴集團仕宦背景的家庭。

77 墓誌碑銘，亦在這方面提供參考資料。例如朱仁表：「其先南陽人，因官徙于太原，後從唐高祖定都長安，遂家于高陵縣人也……曾祖朗，周朝上柱國；祖明，隋護軍；父君卿，唐元從上騎都尉；屬太宗文武神堯皇帝奉天革命，應天順人，遂附翼紫宸，攀鱗黃道，于時扈從，行至長安，制曰：誠表經綸，義同宛沛，宜遵先澤，錫以戎班。昔蕭相國之隨漢，早識興亡；宮之奇之去虞，深知向背。美矣哉國史詳矣。」見〈大周故儒林郎飛騎尉行嵐州合河縣尉朱府君墓誌銘并序〉，《唐代墓誌彙編》上冊，頁 916。另一個例子是李弘禮：「望出趙郡，所居中都，洛陽人也。君之曾杲，齊任益州九隴縣令；祖顯，隋任荊州刺史；父雲，唐任朝散大夫……君父唐初起元從人也。興王佐命，業定披荊，附鳳攀龍，志存社稷；風雲從虎，氣貫長虹。厥旨傳芳，於斯未泯。」見同書〈大周趙郡上輕車都尉故李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1043。以上例子所涉及的人物，無論出身及地域淵源背景，皆與關隴集團沒有直接關係。

78 《冊府元龜》，卷 345〈將帥部．佐命六〉，頁 4088。另一個見於《冊府元龜》的例子是蘭謀：「仕隋，大業末，以鷹揚將軍留守臨汾。義旗建，率所部來降，從高祖平京城，授左光祿大夫，為太子左衛率，又從太宗破宋金剛及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徐圓朗等，皆有戰勳，數蒙賞賜。」見同書，卷 357〈將帥部．立功十〉，頁 4233－4234。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亦蒙李淵委遇。盧士良是瀛州刺史盧士叡之弟：「仕隋為右親衛。大業末，見天下已亂，不求仕進，潛結英豪。及義師西上，與兄士叡同舉兵，得百人，來謁高祖於汾陰，甚蒙接遇，以為軍頭。擊桑顯和于飲馬泉，敗屈突通于潼關，俱有戰功，位柱國。」[79] 及至李淵部隊進入關中地區，歸降的隋朝守臣，更絡繹於途。[80]

有時候，李淵為了招納隋朝的才智之士，甚至無視他們曾經有虧道德品格的行為，鄭元璹（?－646）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例子：「大業中，出為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璹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參旗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81] 鄭元璹雖有材幹，惟薄於孝行，為時人所不齒：「元璹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凊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82] 這件事情，反映李淵招納楊隋舊臣時，似乎刻意漠視道德價值，而材能重要性高於德行的取向，正是鄭元璹得到重用的時代背景。及至天下一統，李氏政權穩固後，統治者才有餘力處理臣下道德品格有所虧欠的問題。[83]

79 《冊府元龜》，卷 345〈將帥部．佐命六〉，頁 4089。

80 《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有關史事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耳。今既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見卷 2，頁 33。當然，李淵從太原率領元從進軍長安時，沿途著意收編的，並非盡是楊隋地方建制的力量，而盜賊豪傑，同樣也在收編之列。有關李淵招納盜賊豪傑以強化實力的史事，見〈隋唐之際的割據勢力——以貴胄出身的李淵和李密為中心〉，頁 9－23；毛漢光，〈李淵崛起之分析——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該文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公司，1992 年），頁 447－485。

81 《舊唐書》，卷 62〈鄭元璹傳〉，頁 2379。審稿專家對於鄭元璹歸降李淵的歷史意義，作出富有啟發性的說明：「鄭元璹棄隋投唐，其實與鄭善果、崔民幹等例子類似，後者兩人且先後擔任招撫山東河北大使、副使，除了兼具山東士族與關隴集團的雙重身分外，其實政治向背各為其主的權力賭注或投資心理，也殊值注意。」權力賭注或投資心理，確實是決定歷史人物行為取向的重要因素。

82 《舊唐書》，卷 62〈鄭元璹傳〉，頁 2380－2381。

83 唐太宗與魏徵嘗在貞觀六年(632)談論擇官的重要性，以及亂世與太平之時選任官員的標準當有那些分別，詳見吳兢（670－749），《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 3〈擇官第七〉，頁 90。這條史料，《通鑑》亦有收載：「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淵在太原謀劃叛變時，所遇上的挑戰和障礙，皆來自效忠楊隋政權官員的力量，即王威和高君雅。李淵進兵關中的過程中，給予他最大的阻力，也是來自效忠建制的楊隋兵馬，當中有部份來自關隴集團中人，屈突通（557－628）可作關隴集團人物份子力抗李淵的例子。下文所載，具體道出屈突通阻截李淵南下長安所作的努力：

> 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眾，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眾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眾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84]

按屈突通是「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可見其地域以及家世仕宦背景，與關隴集團有很密切的關係。[85] 引文提及桑顯和向屈突通部屬說「汝並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可用也。』」見《通鑑》，卷 194〈唐紀十〉，頁 6101。

84 《舊唐書》，卷 59〈屈突通傳〉，頁 2320－2321。唐高宗（李治，628－683，649－683 在位）之世所頒布的〈授武士彠等子孫官詔〉之中，將從太原舉兵西入關中時所遇上的強敵屈突通，以及李世民經營山東時所招降收編的程知節（589－665）和秦叔寶（?－638）等人，一律稱為「西府舊僚」。見王溥（922－982），《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45〈功臣〉，頁 802－803。這種陳述方式，模糊了屈突通曾經一度是李淵進兵關中最大障礙的史事。

85 《舊唐書》，卷 59〈屈突通傳〉，頁 2319。

西人」，即《通鑑》所云「汝輩皆關中人」。[86] 這個用詞，道出楊隋防衛關中的力量主要來自當地人。及至李淵兵臨長安，力抗李淵軍隊的陰世師是武威人，家世背景亦與關隴集團有密切關係：陰世師的祖父陰嵩，仕北周為夏州刺史；父陰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楊堅進位丞相後，「引壽為掾」，自此廣建功勳，「卒官，贈司空」；陰世師本人「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捕擊吐谷渾及黨項羌和征討盜賊，往往克捷，隋煬帝幸江都，「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87] 李淵在義寧元年（617）十一月攻克長安，隨即對妨礙其創業的建制中人施以報復：「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88]

李淵打擊清除淵源自關隴集團而擁護楊隋政權的力量，並不只限於誅殺骨儀諸人，唐初名將李靖（571－649），亦嘗險遭不測。李靖乃韓擒虎（538－592）之甥，與關隴集團關係深厚。[89] 他仕唐以來戰功卓著，受到李淵讚賞，每云：「李靖是蕭銑（583－621）、輔公祏（?－624）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90] 觀李淵之言，似可證其厚遇關隴集團人物，惟兩人關係，開始時並不如此親厚。李淵初入長安時，嘗因私怨而欲誅殺李靖：「馬邑郡丞三原李

86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68。

87 《隋書》，卷 39〈陰壽傳〉、〈陰世師傳〉，頁 1148－1149。另一位殉國的隋臣骨儀，是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見《隋書》，卷 39〈陰壽傳〉和〈陰世師傳〉，頁 1149－1150。

88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62。胡三省根據《隋書》有關陰世師和骨儀的記載，作出以下評論：「如是，則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發墳墓、毀家廟，拒守不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觀《通鑑》所書，可謂微而顯矣。」見同書，頁 5762。

89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27。

90 《舊唐書》，卷 67〈李靖傳〉，頁 24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91] 所謂「素與淵有隙」和「私怨」，是指李靖任職馬邑郡丞時：「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可見李淵甫入長安後所清算的效忠楊隋政權人物之中，有相當成份屬於關隴舊族，而日後廣建功勳的李靖，正屬一例。李靖大呼之後，「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92] 李靖雖為李淵所用，仍有時候不免再蹈殺身之險：

> 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為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93]

李靖又再一次身陷險境，似乎表現出李淵並沒有忘記舊恨，遇上不順意的事情，即動殺機，故「既往不咎」一詞，實堪玩味。[94]

---

91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62－5763。

92 《舊唐書》，卷 67〈李靖傳〉，頁 2475－2476。李靖得到李世民優待，與其聲名能力頗有關係：「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見《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63。杜光庭（850－933）嘗撰文敘述紅拂女私奔，是促使李靖北走太原的原因，見〈虯髯客傳〉，收入李昉（925－996）主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193，頁 1448。這篇小說，是杜光庭有感而發之作。他生於晚唐，目睹世變，認為野心軍閥正是亂世的始作俑者，所以強調：「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細觀〈虯髯客傳〉內容，史事錯謬之處甚多，例如煬帝幸江都時，楊素（？－606）已經去世多年，而李靖嘗奏李淵蓄有異志，更險被李淵所殺，所謂投奔太原，不外乎小說家言，以娛讀者，故亦不必深究。但這篇小說道出了不容於建制，是當日材智之士投向反建制陣營的原因，與本文的論點吻合。

93 《舊唐書》，卷 67〈李靖傳〉，頁 2476。

94 審稿專家對於李淵入據長安後，陰世師、骨儀及李靖等人即淪為清算打擊對象的原因作這樣的說明：「這裡牽涉到關隴集團面臨權力分配時，避免不了政治學所謂集團內鬥、圈內競爭的現象，何況魏晉南北朝改朝換代頻仍，忠道的講究遠遠不如孝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關隴人物之外，效忠隋煬帝的臣僚，有部份來自其他地區；與屈突通一同受命抵抗李淵軍隊的堯君素，也是效忠楊隋的武將，最後更守節殉國。堯君素是魏郡湯陰人，從地域淵源的角度而言，並不屬於關隴集團。[95] 相對於屈突通，堯君素的「誠節」更為矚目。《隋書》本傳記載有關的事蹟如下：

> 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

引文所載，清楚道出堯君素對楊隋政權的忠誠，猶在屈突通之上。當時李淵軍隊已經漸次攻取河東地區各個戰略據點，堯君素守衛的城池被唐軍圍困，救援不至：「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眾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96] 由於堯君素忠於所事，最後更身殉國難，

道，這是時代環境使然。」這個說明，明確道出了關隴集團內部鬥爭的根本原因。集團內鬥和圈內競爭，綜觀唐代歷史，可謂歷久不衰，毛漢光嘗以進士科為主線闡述這個現象，詳見〈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頁 339－363。關於中古之世的忠孝先後觀念，可參考趙翼(1727－1814)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卷 12〈江左世族無功臣〉，頁 253－254；《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2009 年），卷 17〈六朝忠臣無殉節者〉，頁 179－180。唐長孺亦嘗著文論述這個歷史課題，見〈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33－248。

95 《隋書》，卷 71〈堯君素傳〉，頁 1654。

96 《隋書》，卷 71〈堯君素傳〉，頁 1654－1655。堯君素被部下所殺後，「傳首京師」，李淵當時以堯君素嘗阻兵抗命，乃將其首級「梟於都市」，以示懲罰。及至李唐政權穩固，李淵早年所持敵我不兩立的觀念開始變得淡薄，而且培養出欣賞對手優點的胸襟：「後帝幸河中，歎其忠於隋室，贈浦州刺史，以勵事君。」見《冊府元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修《隋書》的史臣，遂把他的事蹟編入「誠節」類傳。不過，《隋書‧誠節傳》的記載，並沒有盡錄當日向隋朝效忠的臣僚，從其他史傳之中，可以瞭解為楊隋守土而非出身關隴集團的臣僚，為數尚多。史稱劉權乃「淮、楚舊族」，大業末年為南海太守：

> 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繼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97]

另一個例子是絳郡通守陳叔達（?－635），他憑城固守，最後因李淵軍隊攻克城池而被俘。[98] 當李淵部隊攻入長安後：「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557－637）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99] 姚思廉是吳興人，其父姚察，在南陳任職吏部尚書。可見擁護楊隋政權的官員，並非全部都是出身關隴，亦即是說，建制擁護者，並不等同關隴集團份子。因此，拙文主張使用「建制」一詞，而非「關隴集團」，原因在於關隴集團的含義，過於強調地域元素，而事實上，當日效忠楊隋政權的文臣武將，並非所有的都來自關隴地區，而他們心中所想，只是純粹效忠楊隋政權；效忠之念，與地域元素似無任何直接而且必然的關係。

由於當日割據勢力遍佈全國，效忠楊隋的官員所要面對的衝擊挑戰，自然不僅只有來自李淵的軍事力量，而李淵起兵時所遇上效忠楊隋地方官的抗拒，經驗上言並不獨特，李密（582－619）亦嘗有過這一類遭遇。[100] 效忠楊隋官員竭力抵抗的事例，道出了李淵和李密結納建制以外的勢力以顛覆建制的做法，可謂正確而且必然：效忠楊隋的文臣武將，根本沒有合作的餘地；建制以外人物，或犯譴的官僚，才是理想的拉攏和合作對象。

卷 138〈帝王部‧旌表二〉，頁 1673。

97 《隋書》，卷 63〈劉權傳〉，頁 1504－1505。

98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49。《舊唐書》以陳叔達「以郡歸款」，是省略了他曾經拒守的過程。見卷 61〈陳叔達傳〉，頁 2363。

99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61－5762。

100 例如張須（565－616，《通鑑》作張須陀）是弘農閿人，為李密所敗：「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眾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張須陁忠於所事而亡，故生平事蹟被置入〈誠節傳〉。見《隋書》，卷 71〈張須陁傳〉，頁 1643－16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淵初起兵時，最大的對手雖然是建制中人，但李淵頗致力於收編楊隋舊臣，所以沒有視那批人為死敵而絕無轉圜餘地。李淵嘗高調地表達自己求才若渴的心態：「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101] 這種說法的目的，不外乎把建制力量收為己用。此外，李淵亦希望藉著收編效忠楊隋政權的舊臣，以提倡忠於所事的觀念，他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具見於對屈突通的嘉獎。史載「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被劉文靜諸軍追及，屈突通兵力殫盡，力屈被擒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102] 李世民對屈突通亦心存敬重，屈突通在貞觀二年（628）去世時：「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卹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103]

101 《舊唐書》，卷 60〈李道宗傳〉，頁 2357。至於李淵高調招納建制中人，是否寓有制衡非建制力量的用意，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歷史問題。觀李淵對於楊隋舊人，特別與自己有故舊之親的前朝官僚待以殊禮，也許並非純屬念舊那般簡單，當中可能寓有權術平衡的意味。

102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3，頁 45；《舊唐書》，卷 59〈屈突通傳〉，頁 2321。後來屈突通跟從李世民東征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見《舊唐書》，頁 2321－2322。

103 《舊唐書》，卷 59〈屈突通傳〉，頁 2322。李淵父子對於提倡效忠所事的做法，亦見於他們對於徐世勣（594－669）的嘉許態度：「武德二年（619），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648）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楊隋之世的關隴集團

李淵倚重建制以外的力量以打擊建制的做法，並非劃時代創作，細觀歷史，類似的事例在前代不斷發生。黃永年嘗撰〈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一文，透過隋朝建國後所任重臣地域及出身背景的分析，指出關隴集團遭受破壞而分崩離析，早在楊隋之世已經開始，而非在武則天（624－705，683－705在位）時代才出現。[104] 楊堅建立隋朝的過程中，所採用的政策，有部份與李淵頗相類似。筆者並不是說，楊堅完全不信任具有關隴集團背景的臣下。事實上，楊堅與李淵的出身背景一樣，都是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所不同的，是楊堅創業過程中，多倚仗在中央政府擔任高職時所得到的機會和方便，以累積篡奪北周的力量。所以，他結納的對象，有相當部份來自關隴系統出身，卻窺察到政權將有重大變動，而希望藉著政權交替時機大展拳腳的官僚，郭榮（547－614）和龐晃（532－603）是當中的顯例。[105] 楊堅傾心結納他們，有時甚至露

而散，朝野義之。」及至貞觀十七年（643），「高宗為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閒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見《舊唐書》，卷 67〈李勣傳〉，頁 2484、2486。這件史事可與屈突通事同觀，反映出降臣對故主忠誠，是李淵父子致力表揚的價值信念，有關的降臣亦因而受到優禮。至於李勣對於李密所表現的忠誠，是否出於個人利益考慮，汪籛在〈李密之失敗與其內部組織之關係〉文中有以下的看法：「是故李勣此舉殆不僅欲成盛德推功之美名，以求見重于唐祖，更欲收維繫人心之實效，藉可自存于鄭、夏兩強之間。」該文收入氏著《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261－269。

104 黃永年在〈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文中，亦提出關隴集團在政壇沒落的原因，是關隴地區實力較山東和江左之區薄弱，人材若不為中央政府所用，實在浪費。此外，山東、江左之區已經出現文武分途，這種演變，令文武合一的關隴集團備受衝擊，而無從長久維繫。黃永年的論文，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頁 154－168。

105 呂春盛論述楊堅篡周建國的背景和原因時，指出「楊堅革命集團乃是北周末年一股不得志的勢力，他們對現狀的不滿成為幫助楊堅篡奪的主要動力」。有關考證論述，詳見〈周隋革命與統治階級的變動〉，收入氏著《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頁 281－350。呂春盛尚有一篇以楊堅篡奪北周作為研究課題的論文：〈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漢學研究》卷 18 期 2（2000 年），

臺灣大學術 期刊資料庫

骨地表達取代北周的想法。[106] 楊堅亦嘗向其他建制中人表達異圖，但碰了釘子。例如榮建緒：

> 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352–425），情類楊彪（141－225）。」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107]

幸而榮建緒沒有公開楊堅的異圖，否則，楊堅便可能因此而遭到殺身滅族之禍。楊堅謀奪北周政權的過程中，亦很著意收納非關隴人物以強化勢力。因此，深為楊堅賞識信用的，有些與關隴統治集團沒有任何淵源，部份甚至出身卑微，例如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僚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108] 楊堅善待陳茂，反映他用人惟材，而不太計較地域和仕宦背景。引文所述的「圓通」，即李圓通，他是京兆涇陽人，但地域上出身關隴地區，不一定就是關隴集團的成員，李圓通家世寒微：「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

頁 167－196。甘懷真亦嘗撰文考述楊堅集團的性質以及重要文臣武將的地域出身背景，見氏著〈楊堅集團與隋朝開國——兼論隋朝立國文化政策〉，該文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 年），頁 711－743。韓昇對於楊堅嶄露頭角以至篡奪北周的史事，也作出了詳細深入的考察，見氏著《隋文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8－116。至於隋朝在楊堅之世的政治鬥爭以及涉及人物的背景及事蹟，可參考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第二章〈開皇年間的政爭〉，頁 23－58。

106 《隋書》，卷 50〈郭榮傳〉，頁 1319－1320；〈龐晃傳〉，頁 1321－1322。

107 《隋書》，卷 66〈榮建緒傳〉，頁 1559。

108 陳茂對楊堅的貢獻，不僅在於「典家事」，其他方面亦甚有可觀：「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見《隋書》，卷 64〈陳茂傳〉，頁 1508－15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109] 可見李圓通乃楊氏家僮，後來因處事態度嚴整，表現特出，才受到楊堅看重，引為心腹，授以大任。楊堅重用家僮的做法，與李淵頗有相似之處。如果將李淵的創業部署與楊堅的做法比較一下，當可發現累積叛變力量的過程之中，凡事必須低調進行，與建制疏離和不容於建制的人物，由於有更大的機動加入反建制陣營，以及因利益關係而深刻瞭解到謹慎保密的必要性，所以成為了積極爭取的對象。倘若從現實政權得到好處的人物之中尋覓爪牙心腹，不但受到抗拒的機會大，更加容易因走漏消息而招殺身滅族之禍。在這種情況下，招納建制以外的力量，相對而言是較為保險穩妥的做法。

隋文帝以建制以外力量衝擊建制的任人原則，亦為其子所沿用。《隋書》記載楊諒（575－605）任職并州總管時：

> 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頒者，梁將王僧辯（？－555）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為諒咨議參軍。蕭摩訶（532－604）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110]

引文道出楊諒謀劃起兵，所委以重任的，皆屬於在現有建制之下不得志而思量悖亂的亡命之徒。楊廣尚為藩王，謀劃建立個人勢力之時，亦出現委任關隴集團以外人物的傾向。史稱楊廣出鎮江都，深悉當地人物聲望的潛勢力，乃很著意善加利用，召用陸知命，是體現這個政策運用的重要例子。陸知命是吳郡富春人：「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111] 楊廣招納南方文士的作風，還見於以下例子：

姓名	出身背景和事蹟
虞綽	會稽餘姚人：「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9 《隋書》，卷 64〈李圓通傳〉，頁 1507。

110 《隋書》，卷 45〈楊諒傳〉，頁 1245。

111 《隋書》，卷 66〈陸知命傳〉，頁 1560。

	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112]
王胄	琅邪臨沂人：「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113]
王眘	王胄兄：「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114]
庾自直	潁川人：「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慾。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115]

楊廣未登大位前，一直有謀奪王位的野心，既要衝擊建制，招納建制以外勢力以成其事，本屬自然；李淵以建制以外的力量打擊建制，無異為這一類歷史事件，增添多一件案例。[116] 及至楊廣即皇帝位，倚任關隴集團以外人物的習尚循而未改，當中尤以南人最受委遇。[117] 受到隋煬帝厚待的南人之中，虞世基（?－618）可以作為代表人物：「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陳亡國後，改仕隋，初不通顯，「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後來受到隋煬帝賞識，「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從此飛黃騰達。[118]《隋書》稱虞世基「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

112 《隋書》，卷 76〈虞綽傳〉，頁 1738－1739。

113 《隋書》，卷 76〈王胄傳〉，頁 1741。

114 《隋書》，卷 76〈王眘傳〉，頁 1742。

115 《隋書》，卷 76〈庾自直傳〉，頁 1742。

116 李松濤在其著作之中，提出一個有關楊廣和李淵拉攏某種勢力以打擊另一種勢力的論點：前者拉攏南方士人以抵制關隴集團，後者則與山東豪傑聯手，以消除自隋煬帝統治時代出現的「南方化」傾向。有關論述，詳見氏著《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9 年），頁 29－54。這個觀點能否成立，相信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書中提到「借力打力」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可謂不乏其例，筆者嘗以漢末三國的蜀漢政權作個案研究，闡述劉焉、劉璋父子如何借用外力以打擊境內的對抗勢力，詳見拙作〈方土大姓與外來勢力：論劉焉父子的權力基礎〉，《漢學研究》卷 19 期 2（2001 年），頁 201－220。

117 劉淑芬論述隋朝對南方的政策時，提出了「關中本位政策的偏離」的看法；論述隋煬帝政權覆亡，強調「關中之離棄」所做成的重大影響。見氏著〈隋代南方政策的影響〉，《史原》期 10（1980 年），頁 59－79。李松濤亦嘗從隋煬帝的家世背景、個人經歷和關隴人物動向幾個方面，分析隋煬帝統治時期所出現「南方化」現象的成因，詳見氏著《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頁 38－41。

118 《隋書》，卷 67〈虞世基傳〉，頁 1569－15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說明他在隋煬帝時代參贊機要的重要角色。[119] 裴蘊（?－618）是隋煬帝另一個非出身自關隴集團的寵臣，他原籍河東聞喜，祖、父輩俱仕於南朝，裴蘊亦嘗仕陳，陳朝覆滅，裴蘊初為楊堅所厚，後更受楊廣寵任。[120] 受到楊廣信用的，尚有裴矩（547－627），亦非關隴集團出身：「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121] 可見裴矩的家世仕宦背景，實與高齊系統有密切淵源。要言之，若揆諸楊廣未即位前的用人作風，當可理解他即位以後任用非關隴集團人物的取向，可謂其來有自。

文臣之外，武將委任的情況亦復如是。觀隋煬帝之世，受到厚待的，有不少並非關隴集團出身。[122] 張定和是「京兆萬年人」，但「少貧賤」，明顯不是來自仕宦之家。張定和征伐吐谷渾時戰死，「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123] 而受到隋煬帝寵待而竭誠以報的武將，亦每多非關隴集團人仕，其中尤以南人為然。有趣的是，隋朝禮重來自南方的將領，實始於楊堅。[124]

119 《隋書》，卷 67〈虞裴等列傳〉末「論曰」，頁 1584。

120 《隋書》，卷 67〈裴蘊傳〉，頁 1574－1577。

121 《隋書》，卷 67〈裴矩傳〉，頁 1582。

122 當然，筆者並非武斷地說隋煬帝完全不信用出身於關隴系統的武將，李景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景是天水休官人，「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可見李景的出身地區以至家族仕宦，都深具關隴集團的性質。李景為將，雖被評為「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故為隋煬帝信用：「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見《隋書》，卷 65〈李景傳〉，頁 1529－1531。但相對於為數眾多來自其他系統武將所受到的重用情況而言，則關隴人物受委遇的程度，可謂膛乎其後。

123 《隋書》，卷 64〈張定和傳〉，頁 1509－1510。

124 例如周羅睺（541－604）是「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後來周羅睺仕南陳為將，卓有戰功，入隋後仍任將帥，亦著戎績：「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洛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見《隋書》，卷 65〈周羅睺傳〉，頁 1523－1525。另一個例子是周法尚（?－614），「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

臺灣大學術 期刊資料庫

對隋煬帝效死節的南方將領之中，較著名的是麥鐵杖（?－612）和沈光（591－618），兩人皆祖籍始興。麥鐵杖武藝超卓，一直受到隋煬帝信用：

> 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頷，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125]

隋煬帝得悉麥鐵杖戰死，「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並下詔褒揚：「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至於麥鐵杖家人以至身後哀榮，楊廣俱優渥以處：「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巨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616）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126]諷刺的是，殺害隋煬帝的主謀，是關隴集團出身的宇文化及與其黨羽，而矢志為煬帝復仇的，則是非關隴出身的將領，麥鐵杖的兒子麥孟才（?－618）是一個例子。史稱麥孟才：

> 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

軍，尋加伏波將軍。」後與長沙王不協，遂歸於周，楊隋建國，文帝賞其戰功：「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見同書卷 65〈周法尚傳〉，頁 1526－1527。楊堅雖然重用一些與關隴集團沒有淵源的人物，惟當日的軍區總管，出身關隴集團的依然佔了壓倒性的優勢，詳見甘懷真，〈隋文帝時代軍權與「關隴集團」之關係——以總管為例〉，該文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487－519。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關隴集團仍舊是楊隋軍事力量的主體，但隋文帝似乎已經意識到吸納帝國內部不同系統淵源人物的重要性；周羅睺和周法尚兩人受到隋文帝重用，也許正是這種心態的具體表現。

125 《隋書》，卷 64〈麥鐵杖傳〉，頁 1512。

126 與麥鐵杖一同戰死的，尚有武賁郎將錢士雄（?－612）和孟金叉（?－612），煬帝亦優予贈典，而且厚卹其家：「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見《隋書》，卷 64〈麥鐵杖傳〉，頁 1512。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618）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簿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127]

文中提到的錢傑，是於遼東之役與麥鐵杖一同戰死的錢士雄之子，出身地不可考，而沈光亦是吳興人：「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可見政治上言，沈光出身成份不好，但其自少驍捷，身手非凡，終以超卓武藝，受到隋煬帝賞識：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619）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俯首事讎，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580–618）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喧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618），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

127 《隋書》，卷 64〈麥孟才傳〉，頁 1512－1513。關於隋煬帝在江都被弒史事，可參考劉健明《隋代治與對外政策》，第五章〈江都事變〉，頁 148－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128]

上引史文，除了道出來自南士的武將為隋煬帝盡死節外，也顯示這些武將對於東征高麗的看法，相較於上文提到投身李淵麾下的劉弘基和長孫順德等關隴舊人，可謂大異其趣：關隴舊人故意犯法，或亡命天涯，目的是逃避隨軍遠征，而東南勇武之士，則視遼東之役為報效之時，或發身之資，因此竭力戰鬥，甚至以戰死為光榮。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來自非關隴地區的戰將而受重用的，還有來護兒（?－618）和陳稜（?－619）。來護兒是江都人，有戰功：「煬帝即位，遷右驍衞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610），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隋煬帝晚年，來護兒依然備受寵遇：「十三年，轉為左翊衞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宇文化及深忌之，江都之難，遂借勢連同其子來整一併殺害。[129] 陳稜是廬江襄安人，同樣受到隋煬帝賞識：「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624）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衞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衞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衞，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130] 編修《隋書》史臣，稱來護兒和麥鐵杖等受到隋煬帝所重用的將領：「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而隋煬帝的獎拔之恩，亦令他們心存感激，竭誠以報：「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131]

當然，本文並非表示向隋煬帝竭盡死節的將領，全部都來自東南地區，宇文化及作亂時被殺的將領獨孤盛（?－618），便是北方人。獨孤盛是獨孤楷之弟，《北史》載獨孤楷的出身背景曰：「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高歡，496－547）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8 《隋書》，卷 64〈沈光傳〉，頁 1513－1515。

129 《隋書》，卷 64〈來護兒傳〉，頁 1515－1516。

130 《隋書》，卷 64〈陳稜傳〉，頁 1519－1520。

131 《隋書》，卷 64〈李陳張張麥沈來魚陳王等列傳〉末「傳論」，頁 1522。

禽，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132] 可見獨孤盛的父親源出於高齊，後來因為上述際遇，才隸屬於關隴集團。獨孤盛深受隋煬帝信用。《隋書》載其事蹟如下：

> 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133]

編纂《隋書》的史臣因為獨孤楷死節，所以將他的事蹟編入「誠節」的類傳。諷刺的是，楊隋政權一直被視為關隴集團發展的延續，惟謀劃殺害隋煬帝的核心人物，竟有不少是來自關隴系統。事實上，關隴集團核心份子倒戈相向，在楊隋之世，時有發生，楊素之子楊玄感（?－613）正是一例。[134] 楊玄感之亂平定以後，關隴集團依然對隋祚構成嚴重威脅。根據《隋書‧宇文化及傳》記載，直接參與弒殺隋煬帝的人物包括：武賁郎將司馬德戡（580－618），校尉元武達，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許弘仁、張愷，李孝質，樂人之子趙行樞，勳侍楊士覽〔宇文化及甥〕，宇文智及（?－619）和宇文化及（?－619）。[135] 這些人之中，司馬德戡、裴虔通、宇文智及和宇文化及四人在《隋書》有傳。司馬德戡是扶風雍人：

> 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

132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73〈獨孤楷傳〉，頁2530。

133 《隋書》，卷71〈獨孤盛傳〉，頁1649。

134 編修《隋書》的史臣對楊玄感叛亂作以下評論：「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見卷70〈楊李趙斛斯劉李裴等列傳〉末「論曰」，頁1636－1637。有關楊玄感叛亂史事以及由此而引申的歷史意義，可參考布目潮渢，〈楊玄感の叛亂〉，收入氏著《唐朝政權の形成》，頁19－52。

135 《隋書》，卷85〈宇文化及傳〉，頁1888－18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607），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136]

上引史文，道出司馬德戡的父親具有北周仕宦背景，其家雖嘗一度淪落，但司馬德戡藉著個人努力，終於恢復了建制成員的身份。司馬德戡既為隋煬帝信用，掌握禁衛，似乎不必謀反，而事實上，司馬德戡並非一開始即想到謀反弒君。《隋書・宇文化及傳》載其事曰：

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627）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137]

136 《隋書》，卷 85〈司馬德戡傳〉，頁 1893。

137 《隋書》，卷 85〈宇文化及傳〉，頁 1888－1889。所謂驍果，並非只來自關中。宇文化及軍情不利，「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見同書，頁 1891。可見驍果之名，到了隋末已經成為戰鬥力堅強部隊的通稱，並不必然包含特殊的地域意味。有關隋煬帝建立驍果制度的用意，以及這種禁衛武力在隋末政治軍事發展變化過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劉淑芬，〈隋代南方政策的影響〉，頁 67－69；気賀澤保規，〈驍果制考——隋煬帝期兵制の一側面——〉，收入氏著《府兵制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99 年），頁 239－266。古怡青考察禁衛大將軍的階級背景和地域來源，亦得到了隋代不再恪守關隴政策而擢拔非關隴以至平民將才的結論。有關論述，詳見氏著〈隋代禁衛大將軍的角色及其地位〉，《中國中古史研究》期 10（2010 年），頁 1－109。黃永年亦嘗撰文論述隋末驍果出現的原因以及制度內容，作者在「附記」明言気賀澤保規持論「與拙文殊多違異」，詳見〈說隋末的驍果——兼論我國中古兵制的變革〉，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頁 119－137。由於筆者這篇文章的要旨不是討論驍果制度，所以只錄有關著作的出版資料，以備讀者參考。

臺灣大學學術規劃資料庫

根據引文，司馬德戡藉以煽惑人心的理據，在於驍果密謀西走，以及隨駕臣僚的家屬身處關中任職地方官，若不能保守城池，即會觸怒隋煬帝，而招殺身之禍。引文提到李孝常以地池降敵，導致隋煬帝對其二弟嚴厲懲處，是司馬德戡作為鼓動禁衞將領叛亂的主要借口。李淵舉兵西入長安途中，得到不少楊隋地方官投誠，而這批官員之中，不乏與楊隋統治者有深厚關係者，例如「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138] 李圓通一直受楊堅眷顧，他亦為其主竭誠盡心，隋煬帝即位後，李圓通的境況出現變化：「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洛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楊廣在李圓通死後，雖然「贈柱國，封爵悉如故」，但對於李圓通的兒子李孝常，已經沒有看顧之念，所以李孝常在大業末年，依然做著「華陰令」這類小官。[139] 李孝常投降李淵，當與其父晚年失歡於隋煬帝有密切關係。李孝常投敵之舉，道出探討關隴集團的性質轉變時，必須注意到家族雖同，但隨著時代改變，人物輩份不同，仕途順逆有別，對於建制的親附感情，亦往往因此而出現變化。正如李孝常因不滿建制而投靠李淵，但入唐以後，又因怨望而圖謀不軌：「高祖時，為利州都督，每以佃獵為務。太宗嗣位，表請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劫盜被誅，因此怨望，與劉德裕等陰圖不軌。」[140] 所以，在同一個家庭之中出現由擁護建制轉變到反建制的舉動，正是一連串環境變遷之下所產生的結果。

以上引文提及另一個通謀者裴虔通，他是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141] 裴虔通的地域背景，與關隴集團沒有任何關係，而他受到隋煬帝親任，始於楊廣尚為皇子出鎮并州之時。可見出鎮地方而收納當地人材，非獨李淵為然，隋煬帝亦優為之。由於隋煬帝視裴虔通為親信，所以得悉他參與叛變，大惑不解而問：「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142] 裴虔通謀反，情況與司馬德戡頗有共通之處。當司馬德戡向元禮和裴虔通說：「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裴虔通的回應是：「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143] 這條史料，既道出關隴與非關隴背景的禁衞將領沒有畛域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8 《通鑑》，卷 184〈隋紀八〉，頁 5754。
139 《隋書》，卷 64〈李圓通傳〉，頁 1508。
140 《冊府元龜》，卷 922〈總錄部・妖妄二〉，頁 10888。
141 《隋書》，卷 85〈裴虔通傳〉，頁 1893。
142 《隋書》，卷 85〈宇文化及傳〉，頁 1890。
143 《隋書》，卷 85〈宇文化及傳〉，頁 1889。

見，所以能夠共談謀反之事，而且也說明司馬德戡所提出的，雖然是煽惑之言，但亦反映出這正是眾人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才會產生休戚與共的情緒，因而一拍即合。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是宇文述之子，從出身背景上言，兩人都是關隴集團的核心份子。司馬德戡當初並沒有弒逆的打算，只是想帶領所部人馬逃歸關中，他嘗向裴虔通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後來宇文智及得悉此事：

> 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144]

以上史料，既顯示宇文化及在才智上言，根本不配做皇帝，同時亦交代了宇文智及在江都事變之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宇文智及蓄意弒逆，以期摧滅楊隋政權，與他際遇不滿所欲有很大關係：

>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鬬，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妒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145]

隋煬帝雖然恢復宇文智及的官位，可惜宇文智及沒有感恩圖報，「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146] 隋煬帝一直倚任南人以建立新的統治力量，但這種做法，並沒有為楊隋政權帶來安穩的局面，反而在日後成為野心軍人煽惑人心的藉口：

> 義寧二年（618）三月一日，〔司馬〕德戡欲宣言告眾，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

144 《隋書》，卷 85〈宇文化及傳〉，頁 1889。
145 《隋書》，卷 85〈宇文智及傳〉，頁 1892。
146 《隋書》，卷 85〈宇文智及傳〉，頁 18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佈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147]

這條史料，可以作為隋煬帝晚年統治階層之中南北對立的證據。[148] 原籍關隴的部隊固然猜忌南人，同樣，有南朝仕宦背景的朝臣亦不信任關隴舊人。所以，當裴蘊知道司馬德戡將要發動兵變，便即想到「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149]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關隴舊人為了共同利益需要而合謀殺害隋煬帝，到了這些人涉及利益紛爭時，又會毫不猶豫地自相殘殺起來。司馬德戡後來設計剷除宇文化及，事敗，宇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司馬德戡的回應是：「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這些說話，似乎顯示楊隋權力核心人物的鬥爭，是關隴集團集體危機意識主導之下的一種表達方式。換言之，司馬德戡為了關隴集團的整體利益，才有謀害宇文化及之舉，頗有清理門戶的況味，但實際原因，實非所說那般高尚。《隋書》記載隋煬帝被殺後：「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司馬德戡被排，「由是憤怨」，遂生剷除宇文化及之念。[150]□可見真正原因，亦不外乎個人利益之爭而已。

以上事例，明確道出向君主盡節與否，與地域集團淵源並沒有必然關係。同樣，君主任用臣下，地域集團背景，亦不是一個顯著而重要的考慮因素。可見所謂關隴集團，對於隋唐之際的統治者來說，是否為一個具有指導約束力量的價值信念，似乎頗有商榷的餘地。大抵西魏初興之際，宇文泰(507－556)憑著個人的材智威望，糾合了一批具有相同背景淵源和價值信念的人物，彼此和衷共濟，開創基業。惟時代日久，舊有人物老去，新進人物登場，昔日集團內部的共同背景淵源以及價值信念能夠繼續保留下來，誠屬疑問。由於不同時期，有不同背景淵源的人物加入建制，關隴集團本來的面貌性質，以至價值信念，遂產生了重大改變。[151] 這種規律，可以充分說明建制被建立以後，隨之而來

147 《隋書》，卷 85〈宇文化及傳〉，頁 1889。

148 隋煬帝傾慕南方文化以及對關隴集團疏離的舉動，進而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詳見《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頁 34－36。

149 《隋書》，卷 67〈裴蘊傳〉，頁 1576。

150 《隋書》，卷 85〈司馬德戡傳〉，頁 1893。

151 宇文泰創立的關隴集團在經歷不同歲月而產生的變化，一直是學者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毛漢光在〈中古核心區核心集團之轉移——陳寅恪先生「關隴」理論之拓展〉闡釋兩魏周齊交戰過程之中，不少來自河東或并州的人物加入關隴集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正是因環境形勢轉變而出現的衝擊，最終令舊有的建制土崩瓦解，而再產生新的建制。關隴集團因時代環境不同而導致性質改變，最終因抵擋不住衝擊而退出歷史舞臺，亦不過是眾多例子當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四、結論

令這個集團不斷擴大。該文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頁 1－27。山下将司則從籍貫關隴化的角度，來探討西魏和北周時期關隴集團成員變化的軌跡，見氏著〈西魏・北周における本貫の関隴化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學術研究》號 49（2001 年），頁 15－28。但必須注意的，是關隴集團不斷擴大的同時，集團初創時的性質面貌亦隨之改變。除了對外戰爭和籍貫改易而引起的變化外，張偉國從集團內部政治鬥爭發展來探討關隴集團出現改變的問題：北周政權建立前，集團內部的派系力量已經受到打壓；政權建立後所推行的文官政治，更導致武將原來享有的優勢遂受到侵蝕。這些因素，都是促使關隴集團產生變化的有力元素。有關論述，詳見氏著《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 年）。雷依群的看法是關隴集團乃宇文泰創立，其後亦由宇文氏族人領導，在這個意義下，楊堅篡奪北周政權，便等同宣告關隴集團退出歷史舞臺，見氏著《北周史稿》（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以上引述諸種著作的要旨，皆在於強調隋唐以前關隴集團所經歷的時代衝擊，進而令集團的性質出現重大的變動。變動既已形成，那麼，為關隴集團在不同時代所呈現的不同性質訂立明確定義，便成為了研究這個歷史課題的重要憑藉。林靜薇在〈關隴集團的初次質變〉文中指出學界討論西魏北周時期的關隴集團時，習慣用柱國大將軍、大將軍或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等軍事性質的官階來做界定，但討論隋唐時期的關隴集團時，往往用中央官員如宰相、尚書六部等官職作為界定標準，標準不一，便難以清楚看出關隴集團的演變過程；表面而言，隋代的關隴集團成員，成份上言與西魏、北周時期不同，但不表示西魏北周以來的關隴集團份子已經蕩然無存，細觀隋代中央禁軍和地方軍隊的將領，有近半來自前朝關隴集團的家族成員，換句話說，那批關隴集團舊有人物雖然在行政系統沒有扮演重要角色，卻在軍事領域展示出雄厚的潛勢力，因此無法將隋代關隴集團與西魏北周完全切割。林靜薇論文刊於《中國中古史研究》期 8（2008 年），頁 107－133。至於關隴集團對於政權決策所發揮的影響力，審稿專家持保留態度，尤其在楊隋及李唐國力鼎盛的大一統時期：「天子富有四海，如隋煬帝與唐太宗用人唯才不分畛域的作風，不管真心或權謀，核心集團的決策運作其實並不影響隋煬帝的所謂南方政策與唐太宗用人政策。」這個看法，清楚說明了權力菁英結構隨著年代不同而發生轉變的實況。以上說明，乃原文所無，承審稿專家提供解說，並建議加入，令拙文這個部份的論證更加充實，筆者謹表謝意。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本文所要闡述的論點，是李淵在太原策劃謀反時，如何帶著關隴集團核心份子的身份，卻積極拉攏建制以外以及不為建制所容之士，並且凝聚這些人的力量，藉以推翻楊隋政權。與李淵父子合謀顛覆楊隋政權者，無論是出身貴家，或來自平民，皆對建制表示失望厭倦，部份甚至是身干罪譴而為建制所不容的亡命之徒，而最為建制所不容的，亦往往成為反建制的急先鋒。就地取材，也是李淵吸納反隋力量的原則和措施。元從功臣之中，除了劉文靜、姜寶誼、長孫順德、竇琮和劉弘基外，其餘人物從地域淵源背景的角度觀之，皆與關隴集團沒有直接而緊密的聯繫。李淵著意拉攏太原地方力量，清楚道出地緣因素的重要性，而李淵結納關隴以外勢力的做法，突顯了採用關隴集團統治力量延續的理論來解釋李唐建國，明顯存在不足：李淵創業的根據地，並非素有淵源的關隴地區，而是一直與關隴集團對立的北齊舊壤，李淵要積聚足夠力量謀反，便必須就地取才；招納過程之中，其他系統的力量被引入，關隴集團的成份亦勢必被沖淡。因此，以往學者以李淵出身關隴集團，所倚任的人物，必然出自這個集團，這種看法實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及至李淵西入長安途中，一方面繼續招納關中地區反建制力量的政策，同時亦開始招徠本來效忠建制的地方官員，這個現象，固然是出於強化進攻長安軍事力量的需要，同時亦由於叛變已經成為事實，亦無需像謀劃時期要慎防走漏風聲。楊隋之世的關隴集團，也是本文闡述的要點。關隴集團草創之時，凝聚了一批同心同德的人物，共同締造功業。惟關隴集團被創立之時，也就是承受衝擊的開始：時代日久，舊有人物老去，新的人物出現，昔日的共同背景淵源和價值信念，便難以繼續保留下來，亦由於不同時期有不同背景淵源的人物加入，關隴集團本來的面貌和性質遂產生了重大改變。事實上，關隴集團內部，一直存在矛盾紛爭，隋煬帝在位時期，嘗透過倚任非關隴集團出身的文臣武將以資抗衡。此外，從隋煬帝被弒事件觀之，起兵叛亂，每多屬於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盡節以抗者，卻多屬非關隴出身的臣僚，而為楊隋守土的，亦有不少是來自其他地域出身背景的臣僚。因此，以集團地域觀念來審視當日出現的歷史事件，甚至強行使用這一類觀念來解釋歷史，恐怕不是合宜的做法，最終亦不能找到歷史真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唐・吳兢，《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唐・楊炯，《盈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宋・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宋・李昉主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清・趙翼，《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
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牛致功，《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
牛致功，《唐高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朱振宏，《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岑仲勉，《唐史餘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汪籛，《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汪籛，《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谷川道雄著、耿立群譯，《世界帝國的形成：後漢——隋・唐》，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年。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2年。

宋德熹，《陳寅恪中古史學探研——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例》，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4年。

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9年。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張偉國，《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黃永年，《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韓昇，《隋文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盧建榮，《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臺北：時英出版社，2010年。

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二）論文：

毛漢光，〈李淵崛起之分析——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公司，1992年，頁447－485。

甘懷真，〈隋文帝時代軍權與「關隴集團」之關係——以總管為例〉，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487－519。

甘懷真，〈楊堅集團與隋朝開國——兼論隋朝立國文化政策〉，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年)，頁711－743。

古怡青，〈隋代禁衛大將軍的角色及其地位〉，《中國中古史研究》期10（2010年），頁1－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德熹，〈關隴集團政權中的河南竇氏——代北外戚家族個案研究之二〉，《興大文史學報》期22（1992年），頁105－144。

宋德熹，〈陳寅恪「關隴集團」學說的新詮釋——「西魏北周系」說〉，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著，《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年，頁239－260。

呂春盛，〈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漢學研究》卷18期2（2000年），頁167－196。

伍伯常，〈方土大姓與外來勢力：論劉焉父子的權力基礎〉，《漢學研究》卷19期2（2001年），頁201－220。

伍伯常，〈從窆昭陵：論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陵功臣〉，《九州學林》卷3期4（2005年），頁2－57。

伍伯常，〈從窆獻陵——論唐初陪陵宗室功臣的生平事蹟及陪陵制度的政治社會意義〉，《中國中古史研究》期10（2010年），頁147－195。

伍伯常，〈隋唐之際的割據勢力——以貴胄出身的李淵和李密為中心〉，《東吳歷史學報》期25（2011年），頁1－56。

李萬生，〈說「關中本位政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4（2010年），頁19－32。

胡戟，〈陳寅恪與中國中古史研究〉，《歷史研究》期4（2001年），頁145－156。

崔彥華，〈東魏北齊「鄴—晉陽」兩都體制形成原因試探〉，《中國史研究》輯62（2009年），頁97－112。

林靜薇，〈關隴集團的初次質變〉，《中國中古史研究》期8（2008年），頁107－133。

雷艷紅，〈陳寅恪「關隴集團」說評析〉，《廈門大學學報》期1（2002年），頁72－79。

楊軍，〈李淵太原起兵的地理因素考察〉，徐少華主編，《荊楚歷史地理與長江中游開發－2008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42－254。

劉淑芬，〈隋代南方政策的影響〉，《史原》期10(1980年)，頁59－79。

二、外文著作

布目潮渢，《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8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気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99年。

山下將司，〈玄武門の變と李世民配下の山東集團—房玄齡と齊濟地方—〉，《東洋史學》卷85號2（2003年），頁19－38。

山下司，〈西魏・北周における本貫の関隴化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學術研究》號49（2001年），頁15－28。

堀井裕之，〈即位前の唐太宗・秦王李世民集団の北斉系人士の分析〉、《駿台史学》號125（2005年），頁21－45。

Howard J. Wechsler, “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7-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Original Company of Li Yuan's Meritorious Officials in the Taiyuan Uprising

NG Pak-sheung *

Abstract

The Guanlong clique seemed to have enjoy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dynastic continuity from the Western Wei to the Tang. The majority of the former officials of Taiyuan however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Guanlong clique in terms of their family and regional backgrounds. Those collaborating with Li Yuan in overthrowing the Sui dynasty had typically shown their hatred and disappointment of the regime and some of them were even desperados not tolerated by the establishments. Drawing on local talents was also a policy adopted by Li Yuan to strengthen his anti-establishment ability. Another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impact and changes experienced by the Guan long clique during the Sui dynasty. Yang Jian and Yang Guang had already made use of the forces alienated by the regime to attack the establishments. In this process, members of the Guan long clique did not enjoy privileges; rather they became the target of persecution and purging. Such historical events indicate the inadequacy caused by applying the viewpoint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e Guanlong clique was the reason for the Tang dynasty's founding.

Keywords: Former officials of Taiyuan, Guanlong clique, Policy of Guanzhong regionalism, Gallant men in Shandong, Establishment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